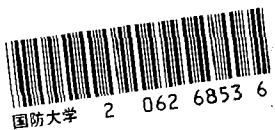


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库·新论语

胡适语萃

耿云志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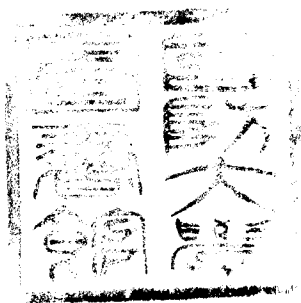
华夏出版社



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库·新论语

胡适语萃

耿云志编



1993年·北京·华夏出版社

(京)新登字 045 号

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库·新论语

胡 适 语 萃

耿 云 志 编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27千字 插页2

1993年9月北京第1版 199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册

ISBN 7-5080-0137-0/Z·132

定价:7.80元

中國
二十
世紀
思想
文庫

啓功題籤





胡 适
(1891——1962)

总 序

张岱年

20 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的转折时代。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凌侵,全国人民奋起斗争,致力于救亡运动。20 世纪之初,孙中山先生发起革命运动。1912 年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彻底完成任务,但是从此以后,谁要再敢建立帝制都成为不可能的了,这就是一个伟大成就。1915 年陈独秀发起新文化运动,从此新的思潮风起云涌,对于陈旧的传统观念进行了猛烈的冲击。继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李大钊等宣传马克思主义,发生了空前深刻的影响。

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西学东渐,西方近代思想引起人们的注意。严复译述《天演论》,起了振聋启聩的作用,同时又广泛地介绍了西方的思想学说。梁启超更以通俗的文笔阐述新学,引起了青年学子的共鸣。章太炎鼓吹革命,也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五四”前后的文化运动,“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胡适提倡文学革命,发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从而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的正统地位。在文学革命中成就最大的是鲁迅,在文学史上具有卓越的地位。

20 年代以来,文化问题、中西文化的异同,成为热烈争论的问题。胡适倾向于“全盘西化”,对于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认识不足。

梁漱溟起而以捍卫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为己任。梁漱溟刚直不阿,表现了中国古代哲人的风范。

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国事日急。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奋起抗日。一些学者努力于学术救国,从事于新时代的中国哲学的创建活动。若干学人提出了自成一家之言的融会中西的学说体系,其中最有影响的有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这些学者的学说虽未必切合时代的需要,但其理论的深邃、论证的精密、与古代哲学家或西方哲学家相比,实毫无逊色,在中国学术史上应有一定的地位。

经过抗日战争及国内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来了,彻底驱逐了外国侵略势力,保卫了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但是50年代后期,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文化学术又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史无前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更给文化学术带来了惨重的灾难。1978年党中央拨乱反正,于是文化学术走上蓬勃发展的坦途。现在到了20世纪最后七年了。在这七年中反过来再看一下20世纪思想学术发展的过程是有益的。总而言之,20世纪是中国学术思想上的一个辉煌的时代,学人辈出,群星灿烂,多家竞胜,蔚为壮观。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比较特殊和复杂的时期,在研究中国20世纪思想史以及评价20世纪思想家时,要做到全面、深刻、客观、公允,确是一件不容易但又意义深远的工作。

首先,是注意不要把中国20世纪思想史与中华民族在20世纪的全部历史隔离开来,因为思想史与文学史、社会史、艺术史乃至政治史都是中国历史的有机部分。同样在评价中国20世纪思想家时,要注意不能脱离他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一个思想家思想的产生、演变、发展及其特点,有其个人因素,也有时代因素。

其次,中国20世纪思想史是整个中国思想史的一部分,也是最“新”的一部分,我们应有历史发展和全面的眼光。我们现在已处

于 20 世纪的最后七年,研究这个世纪的中国思想史,既不能脱离 18、19 世纪乃至更早时期的中国思想史、又应注意中国 20 世纪思想史所具有的特点,还应想到为了下一个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的更新和光大。

再次,在研究、评价 20 世纪的中国思想家时,要注意实事求是,切忌把学术思想与政治倾向、处世方式等相混淆,注意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思想之特点,把握学术思想演变中的主流,当然也要客观研究某些因素对其思想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地评估思想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及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价值和意义。

“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库编辑委员会”重点选择中国 20 世纪有重要贡献的学者为文化发展、民族振兴所作有意义的探索的思想成果,辑录成《新论语》丛书,每人一卷。编者均为国内学有根底的中青年学者。我认为这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对于学术发展、文化建设将有重大的裨益。刘耿、王骏等同志希望我为这套丛书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个人对于中国 20 世纪学术思想的观感,聊供读者参考。

1993 年 1 月序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编 序

胡适字适之，祖籍安徽绩溪。1891年12月17日生于上海。1895年回到绩溪家乡，入塾读书。1904年进入上海的新式学堂，先后就读于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和中国公学。这时期，他接受西学，受到严复、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很大。在中国公学里，因校内革命气氛甚浓，胡适也结交了一些革命党的朋友。公学里出版一种刊物叫《竞业旬报》。胡适从第24期起，接任主编。在《竞业旬报》上，胡适用期自胜生、希强、适之、铁儿、适庵、冬心、骅、蝶等笔名先后发表了40多篇文章和大量的新闻、时评、杂俎等文字，还有不少诗词。文章中颇有一些激烈攻击旧礼俗和讥弹政府官吏的文字。主编《竞业旬报》对胡适是一种重要的文字训练。可以说，他思想清楚，文字浅显，明白晓畅的文风，这时便初步打下了根基。

1910年夏，胡适考取庚款留学的官费生，渡洋赴美入康奈尔大学，先学农科，一年多以后转入文科。1915年，他离开康奈尔大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博士学位。

胡适从杜威那里受到的最大影响是对思想方法的高度重视。由此使他对中国千余年来特别是近三百年来非常盛行的古典治学方法——考证学——有了崭新的理解。此外，杜威的政治哲学——和平改革，也成了对胡适有终生影响的一个方面。

但在哥大期间，胡适最为热衷的，也是为他一生事业奠定基础的，却是文学革命的尝试。

胡适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凡优秀的能够流传的作品,大多是白话或近于白话的作品。而那些古奥晦涩的作品,都徒具文辞而没有生命力。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古文是半死或已死的文学,白话才是活文学。他主张用活泼的有生命力的白话文学去代替僵死的古文学。于是他喊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主张“作诗如作文”,主张用白话创造一切文学。

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的影响。

(一) 西方写实主义文学。胡适到美国后,得机会充分接触西方著名文学家的作品,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萨克雷,法国的都德,俄国的契可夫、托尔斯泰等等都是他深表崇敬的现实主义伟大作家。对于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尤有兴味。他深深感受到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力量。对照中国当时的文坛,胡适认为:“今日文学大病,在于徒有形式而无精神”。^①又说:“吾国文学大病有三:一曰无病而呻;二曰摹仿古人;三曰言之无物。”^②要救此诸弊,他主张“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避之”。^③所谓“文之文字”,就是指白话或接近于白话的文字。

(二) 文学进化观念。清末民初,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差不多都是进化论的信仰者。胡适也不例外。他用这一观念来观察中国的文学史,使他产生了文学进化的观念。他指出,以诗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是一大进化;又变为五七言诗,是又一大进化;诗变为词,词又变为曲,皆是文学的进化。散文、小说、戏曲的递进演变也可证明此理。总之,“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代替‘死文学’的历

① 《胡适留学日记》(三)第844页。

② 《胡适留学日记》,第893页。

③ 《胡适留学日记》,第844页。

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①

（三）平民主义观念。胡适深鄙有些文字古奥的文学作品只配作贵族的消遣品，与大众的生活不发生关系。他受英美民治主义思想薰染，认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人之私产，而当以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文学要普及，就必须大多数人能看得懂，听得懂，那就只有用白话。所以他以白话文学代替古文文学的观念，是以深挚的平民主义为基础的。

1916年秋冬，胡适应陈独秀之请，把他的文学革命的基本主张用很谦虚的口气写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寄到国内。1917年1月，《新青年》杂志登出此文。该文提出的八项具体主张以后成为文学革命论争的主要问题。这八项主张是：（1）须言之有物；（2）不摹仿古人；（3）须讲文法；（4）不作无病之呻吟；（5）务去烂调套语；（6）不用典；（7）不讲对仗；（8）不避俗字俗语。文章发表后，反响极为强烈。陈独秀趁热打铁，紧接着发表《文学革命论》，把胡适的温和的学理式的具体主张，干脆变成了革命的宣言。

1917年7月，胡适自美归国，9月到北京就任北京大学教授，开始与《新青年》的主编、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共事。并很快结识了北京的一派新人物，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周树人、周作人、陶孟和、丁文江、刘半农、汤尔和等。而年高德劭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则是他们共同拥戴的长者。他们以《新青年》为阵地，以北京大学为大本营，展开了积极的富有创造性的活动。《新青年》所开启的革新思潮，这时已成为包括文学、思想、道德、政治等各个方面内容十分丰富而又有相当深度的、赢得全国进步青年和知识界热烈响应的、震荡全国的新文化运动。在这个运动中，胡适与陈独秀

^① 《逼上梁山》，《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9—10页。

齐名，被公认为领袖。他在好几个方面发挥了有力的影响。

（一）继续推动文学革命运动

《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反对的意见时有发表。争论最集中、最激烈、最牵动社会注意力的是白话与文言的问题。当时反对文学革命和持怀疑态度的人，集中责难胡适只讲文学形式的革新，而不讲文学内容的革新。胡适回答他们说：“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做里子。但是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①在他看来，文学形式的变革正是为文学内容的变革创造必要的条件。胡适看到，要真正解决白话文学代替文言文学这个问题，必须成功地创造出有价值的白话文学作品来。1918年4月，他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堂堂正正地标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系统提出创造国语的新文学的方法的意见。这是胡适有关文学革命问题最有分量的一篇大文，被郑振铎诤之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胡适积极提倡文学写实主义，提倡短篇小说，提倡戏剧改革，但他贡献最大的，是对于新诗的尝试。在白话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白话新诗是最受守旧派的反对的。1919年10月，胡适发表长篇论文《谈新诗》。这篇文章因解决了新诗争论中最关键的音韵的问题，因而为新诗的成立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根据。

著名新诗人朱自清说，胡适的《谈新诗》“差不多成了诗的创造与批评的金科玉律了”。^②1920年3月，胡适的白话新诗集，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尝试集》出版。这部诗集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新诗创作上有多大的成功，而是在于它所代表的“尝试的精神”。著名文学史家陈炳堃说：“《尝试集》的真价值，不在建立

① 《尝试集自序》，《胡适文存》卷1第279页。

② 《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第2页。

新诗的轨范，不在与人以陶醉于其欣赏里的快感；而在与人以放胆创造的勇气。”^①

为促进新诗的发展，胡适明确提出向民歌学习的主张。他积极赞助新诗园地——《诗刊》的创办。可以说，不管胡适自己新诗的造诣如何，他作为中国新诗创作的开山人物，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被抹掉的。

（二）推动思想解放运动

在新文化运动中，最使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为之激动的是个性解放与思想自由。1918年6月，胡适发表《易卜生主义》一文，极力宣扬易卜生关于充分发展个人的个性与才能的主张，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而要发展个人的个性，“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他最欣赏易卜生的一句话：“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个性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要解放人，就必须争得社会自由。胡适强调说，应当“极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养成一种自由的空气。”^② 1920年8月，他同北大教授蒋孟麟、李大钊、高一涵等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抨击北洋政府自袁世凯以来实行假共和真专制；要求废除一切破坏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徙及人身等项自由权的法律命令；切实保障人民几种基本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这些要求虽不能实现，但终究是一种正义的抗争。

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里极力鼓吹“重新评定一切价值”的口号，这是五四时期新思潮所表现的真正最激进的态度。从这种态度出发，可以打破一切教条，可以根本改变人们对待传统道德、礼俗等等的看法。比如胡适就对“孝”的观念提出异议，对女子贞操

① 陈炳堃：《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第227页。

② 《不老》，《胡适文存》卷4，第126页。

问题提出全新的见解。他认为贞操应是男女双方互相对待的一项道德原则,不能单独要求女子守贞。如此等等。这些都是一反千余年来圣贤遗教,令卫道者们惊骇不置的“异端邪说”。

此外,他关于女子解放、节制生育的鼓吹等等都有推动思想解放运动的意义。

(三) 教育改革

胡适是北京大学里一位最年青的教授,由于他富有新思想,又加上新文化运动中所得到的声誉,使他对教育改革问题获得了充分的发言权。他就任北大教授的头一年就创办了哲学研究所,以利于毕业学生继续深造。他提议组织教授会来管理教学,造成教授治校的新风范。他提议实行选科制,有力地鼓励了青年学子的主动精神。倡办其他多种研究所,鼓励、赞助出版学术刊物,支持学生自办的文化学术团体等等,这些对于改造旧北大官僚子弟沿袭下来的恶劣风气,推动学生青年的思想进步、奠定新式高等教育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 传播实验主义

1919年春,胡适发表《实验主义》一篇长文,介绍美国最有影响的一种资产阶级哲学,实验主义。特别对杜威的哲学做了更较详细的介绍。不久,杜威亲来中国讲学,胡适为作翻译,还陪同杜威到各地去演讲,有力地扩大了杜威哲学的影响。从杜威的思想出发,胡适在总结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时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认为这就是科学方法的基本内核。尽管杜威的方法有种种缺欠,尽管胡适的概括亦容有未当之处,但在当时被引进来的所有资产阶级哲学,都没有像胡适对实验主义的介绍这样简明、通俗、易懂,因而发生那么广泛的影响。自然,大多数进取的青年知识分子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来领受实验主义哲学,从中体认它怀疑的勇气和实验的精神,而不是接受它整个的体系。

二

1919年2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出版。这本书以其观点和方法的新颖而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注意。蔡元培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说,治中国哲学史,一方面须有深厚的“汉学”工夫,另一方面又须有系统的方法。系统的方法在中国学术史上无可借鉴,只有借鉴西洋哲学史。然而懂汉学的人很少懂西洋哲学史的。而留过学懂得西洋哲学史的人,又多不具备“汉学”工夫。唯有胡适既有“汉学”工夫,又熟悉西洋哲学史,故能成就此书。中国学者用新方法治哲学史,胡适可算是开山的人。

胡适在学术上取得重要成功的另一个领域是对于中国几部著名古典小说的研究。

1920年7月,胡适写成2.5万字的《〈水浒传〉考证》。文章用严格的考证方法求出水浒故事的历史演变,揭示人物典型的形成与创造过程,以及成书之后的版本源流与变迁等等。这种推寻历史演化踪迹的方法,是考证学的一种新的应用,它启发了年青的历史学家顾颉刚。顾氏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显然是同胡适的启迪有密切关系的。

1921年11月,胡适又写成《〈红楼梦〉考证》。他打破清末以来种种附会的索隐派红学的迷雾,第一次提出《红楼梦》乃是作者自叙身世的一部写实主义的小说。从而把《红楼梦》研究引导到正当的学术范围,成为一种专门学术问题。

在以后的七八年里,胡适又相继写了十几篇古小说考证的文字。经他考证和介绍的几种小说,一时都成了畅销书。

胡适如此津津有味地做这些小说考证,是同他更大的工作目标相联系的。这个目标就是所谓“整理国故”。胡适认为,现代的中

国人对于自己民族过去的遗产应当做一番整理和评判的工夫，一要辨明真伪；二要“重新估定价值”。他指出，国故就是“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整理国故“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①“这是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②简言之，“我们的使命是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③

在整理国故的总目标下，胡适提出“疑古”的口号，他认为古史的材料甚多，而可信的东西甚少，需要学者做考信的功夫。他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④在他的影响和鼓励下，顾颉刚等人在一个时期里专意从事辨伪书，辨伪事，辨伪史的工作，人称“古史辨派”。胡适本人在历史学方面的兴趣始终以中国思想史为主。继《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之后，他断断续续地续写中国中古思想史。当写到佛教的禅宗史时，他发现可信的材料太少，不得不搁笔以待新材料的发现。1926年，他为中英庚款的事去欧洲，得机会到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查阅敦煌写经卷子。从中发现了禅宗和尚神会的语录2万多字。中国原有关于神会的材料只有六百余字，这同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胡适回国后，陆续整理他的发现，于1930年出版《神会和尚遗集》，其中包括一篇2.6万多字的神会传。《神会和尚遗集》的出版很受日本学者的重视。此后直到晚年，胡适对禅宗史的研究始终饶有兴趣并与日本学者保持交往。

胡适的整理国故，实质上是借鉴西方的新方法来重新整理本

① 《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卷4，第162页。

② 《整理国故与打鬼》，《胡适文存》三集卷2，第211页。

③ 《胡适的日记》（1922年8月26日）。

④ 《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第1册第23页。

民族的历史遗产,是中西文化在学术上互相融通的具体表现。所谓新文化运动,本来就是中西文化既相冲突又相融通的一个历史运动。胡适是这个运动中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二三十年代他相继主持整理国故与编译西书两项大规模的学术文化活动。只因社会环境的不安定,使两项工作都无法长期坚持进行下去。

借鉴和学习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的旧文化,创造现代的新文化,在进步的中国人看来,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复古派与国粹派并不这样看。只是他们人数不多,又拿不出像样的理论来,所以影响不大。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使西方人对自己的文明怀疑起来,欧美都出现了一股保守主义思潮。当时欧游归国的梁任公先生发表《欧游心影录》,喊出“科学破产”的口号。许多和梁先生一样本来并不守旧的人,也都怀疑西方文明,把希望寄托于重振东方文明。于是保守主义思潮陡然抬头。1921年,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3年,张君勱在清华发表《人生观》的演讲,两者都表现出对科学、对西方文化怀疑与批判的倾向。胡适相继发表《评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科学与人生观〉序》两篇长文,严厉地批评了贬抑西方文化,鼓吹东方文化的保守主义倾向。他强调人类文化的同一性,强调科学与民主应是各民族现代发展的共同方向。1926年,胡适又发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文章集中批评那种把西方文明说成仅仅是物质文明,中国文明才是精神文明的谬论。他强调说,任何文明都包含着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西方文明着重人的物质享受的正当性,努力发展物质生产,提高人的生活水准,创造生活上的种种便利,以解放人的精神创造力,从而产生了高度发展的科学、艺术及各种文化,其道德与政治生活也跟着得到提高。从18世纪的自由、平等、博爱到19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主义,都是东方人未曾梦见的精神文明的产物。中国的精神文明的最高产物是士大夫的心性修养论。然而人们“越向内做工夫,越看不见外面的现实世